DOI: 10.6939/HIJBS.202110_4(2).0007

犍陀羅舍利供養圖像及其在漢地的新發展

李靜杰（清華大學）
孫明利（英屬哥倫比亞大學）

摘　要：犍陀羅發達的佛傳故事雕刻，客觀上促成舍利供養圖像之流行。犍陀羅舍利供養圖像不僅作為佛傳故事一環表現，進而演化出代表佛法乃至佛教的象徵意涵，并且出現著重個人情懷的持舍利供養圖像，這是西北印度犍陀羅文化有別於印度本土之處。在犍陀羅文化影響下於南北朝後期，中原北方地區東部、成都地方持舍利供養圖像流行開來，繼而於唐前期，洛陽地方、川北地區繼續流行持舍利供養圖像。這些出現在大乘佛教氛圍中的圖像，應該表述舍利為波羅蜜熏修所成的菩薩行思想，兼有象徵並傳承佛法的功能。

關鍵詞：舍利供養圖像、犍陀羅、南北朝隋唐造像

經典文獻有關舍利供養記述，大體可以分為小乘佛教、大乘佛教兩種情況。小乘佛教系統典籍通常作為釋迦佛涅槃過程的一個環節描述，主要見於阿含經系統典籍。諸如，原始佛教經典《長阿含經》記述，採用轉輪聖王葬法安置入涅槃釋迦佛，焚化之後收取舍利，在四衢道上起塔供養，使人們思慕佛陀教化，獲福無量[1]。長阿含經單本經《大般涅槃經》記述，拘屍那城力士以金瓶收取舍利，載之乘輿還歸入城，婆羅門徒盧那於高樓上均分舍利，以舍利瓶盛之，授予八王，各起塔廟供養[2]。又如《雜阿含經》記述，釋迦佛逝後兩百年，阿育王取出七塔中之舍利並獲得龍宮中舍利，乃建八萬四千塔而行供養，於是釋迦佛塔廟遍滿閻浮提[3]。屬於小乘涅槃

---

[1]（後秦）佛陀耶舍、竺佛念譯於弘始年間（399–416）《長阿含經》卷 3〈遊行經〉：“時，阿難即從座起，前白佛言，‘佛滅度後，葬法云何？’…… 佛言，‘欲知葬法者，當如轉輪聖王。…… 阿難！汝欲葬我，先以香湯洗浴，用新劫貝周遍纏身，以五百張疊次如纏之。內身金棺灌以麻油畢，舉金棺置於第二大鐵槨中，旃檀香槨次重於外，積眾名香，厚衣其上而闍維之。訖收舍利，於四衢道起立塔廟，表剎懸繒，使諸行人皆見佛塔，思慕如來法王道化，生獲福利，死得上天。’”《大正藏》編號 1，第 1 冊，第 20 頁上欄第 22 行至中欄第 11 行。

[2] 法顯（337–422）譯《大般涅槃經》卷下：“諸力士眾，即以金甕收取舍利，置寶輿上，燒香散華，作眾伎樂，還歸入城。起大高樓而以舍利置於樓上，即嚴四兵，防衛守護。…… 鳩尸那城中，有一婆羅門，名徒盧那，聰明多智，深信三寶。…… 婆羅門復語王言，‘我已相為和，諸力士皆悉與汝舍利之分。可取寶瓶，為汝分之。’八王歡喜，奉授金瓶。彼婆羅門，受諸金瓶，持以還歸，於高樓上而分舍利，以與八王。于時，八王既得舍利，踴躍頂戴，還於本國各起兜婆。彼婆羅門從諸力士，乞分舍利瓶，自起兜婆。諸力士等取其一分，於闍維處，合餘灰炭而起兜婆。如是凡起十處兜婆。”《大正藏》編號 7，第 1 冊，第 207 頁上欄第 17 行至下欄第 8 行。

[3] 求那跋陀羅（394–468）譯《雜阿含經》卷 23：“時，（阿育）王欲建舍利塔，將四兵眾，至王舍城，取阿闍世王佛塔中舍利，還復修治此塔，與本無異。如是取七佛塔中舍利，至羅摩村中。時，諸龍王將是王入龍宮中，王從龍索舍利供養，龍即與之。…… 時，（阿育）王作八萬四千金、銀、琉璃、頗梨篋，盛佛舍利；又作八萬四千大寶瓶，以盛此篋；又作無量百千幡幢繖蓋，使諸鬼神各持舍利供養之具，勅諸鬼神言，‘於閻浮提，至於海際，城邑聚落滿一億家者，為世尊立舍利塔。’…… 如是乃至一日之中，立八萬四千塔，世間民人，興慶無量，共號名曰‘法阿育王’。”《大正藏》編號 99，第 2 冊，第 165 頁上欄第 13 行至中欄第 13 行。

經系統的《佛滅度後棺斂葬送經》記述，釋迦佛囑託弟子阿難，自己滅度後留存缽和舍利，虔心供養者將來生天[4]，示意釋迦佛涅槃後舍利與缽成為其代表或象徵。

大乘佛教系統典籍認為舍利是諸波羅蜜熏修所成，亦即經由佈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諸菩薩行而來。其中，般若（即智慧）波羅蜜尤其受到重視。諸如，《放光般若經》記述，舍利是波羅蜜之載體，由波羅蜜和合所成，恭敬供養舍利者將來往生婆羅門、剎帝利種姓家，乃至往生為天王，離苦得樂[5]。《摩訶般若波羅蜜經》記述，諸佛舍利出生於般若波羅蜜，是般若波羅蜜熏修所成，供養舍利功德無量[6]。般若經釋論亦云，得般若波羅蜜要義即入佛道，若供養般若波羅蜜載體舍利亦得成就佛道[7]。可見，舍利與波羅蜜的關聯，實即載體與內涵之統一，已而被演繹為佛骨所代表的生身

---

[4] 失譯人名附西晉（265–316）錄《佛滅度後棺斂葬送經》：“佛告阿難：‘吾雖滅度，後留缽及舍利，若有賢者肅心奉養，終皆昇天。’”《大正藏》編號 392，第 12 冊，第 1115 頁上欄第 22 行至第 23 行。

[5] （西晉）無羅叉譯《放光般若經》卷 7〈舍利品〉：“釋提桓因報阿難言，‘舍利者，是諸法波羅蜜之器，以諸法波羅蜜合成故，舍利得供養。……若善男子、善女人供養舍利，恭敬承事者，得天上世間之福，得生剎利、梵志、長者大姓家，得生第一四天王，得第六天上功德之福。殖此福已，因諸善本必度眾苦。’”《大正藏》編號 221，第 8 冊，第 52 頁下欄第 9 行至第 53 頁上欄第 6 行。

[6] 鳩摩羅什（344–413）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10〈法稱品〉：（釋提桓因言）“復次，世尊！置三千大千世界滿中舍利，如恒河沙等諸世界滿其中舍利作一分，有人書般若波羅蜜經卷作一分。二分之中我取般若波羅蜜，何以故？是般若波羅蜜中生諸佛舍利，是般若波羅蜜修熏故，舍利得供養。世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供養舍利，恭敬尊重讚歎，其功德報不可得邊。……我不為輕慢不恭敬故不取舍利，以善男子、善女人供養般若波羅蜜則為供養舍利故。”《大正藏》編號 223，第 8 冊，第 292 頁上欄第 19 行至中欄第 9 行。

[7] 龍樹（？–250）造、鳩摩羅什（344–413）譯《大智度論》卷 59〈釋校量舍利品〉：“人見如意寶珠，所願皆得；若見珠所住處，亦得少願。行者亦如是，得是般若波羅蜜義，即入佛道；若見般若所住舍利供養故，得今世、後世無量福樂，久必得道。”《大正藏》編號 1509，第 25 冊，第 479 頁上欄第 28 行至中欄第 3 行。

舍利，以及經卷所代表的法身舍利[8]。值得注意的是，從屬大乘涅槃經的《蓮花面經》記述，釋迦佛缽與舍利大放光明、教化眾生，將來為彌勒佛所起塔供養[9]，意味著舍利與佛缽一樣，具有象徵並傳承佛法的作用[10]。

一、犍陀羅舍利供養圖像

已知最早的舍利供養圖像，見於中印度約前二世紀末葉巴爾胡特窣堵波欄楯浮雕，表現為騎象者左手扶舍利盒右手持象鉤向前行進的情景（圖 1）。這裡僅保存了窣堵波東門和兩側欄楯，不清楚原初是否存在其他相關舍利供養圖像。中印度約一世紀初葉桑齊大窣

---

[8] 智顗（539-598）《妙法蓮華經文句》卷 8〈釋法師品〉：“夫佛生處、得道、轉法輪、入涅槃等處，法王所遊皆應起塔。此經是法身生處、得道之場、法輪正體、大涅槃窟。此經所在須塔供養，不復安舍利者。《釋論》云：‘碎骨是生身舍利，經卷是法身舍利’。此經是法身舍利，不須更安生身舍利。生法二身各有全碎，皆可解。”《大正藏》編號 1718，第 34 冊，第 110 頁中欄第 28 行至下欄第 5 行。

[9] 那連提耶捨（490–589）譯《蓮華面經》卷 2：“佛告阿難：‘如是我缽及我舍利所放光明，十方世界作佛事已，還至本處，在於舍利、佛缽之上，於虛空中成大光明雲蓋而住。阿難！舍利及缽現大希有如是等事，現此神通希有事時，八十百億眾生得阿羅漢果，千億眾生剃髮出家信心清淨，一萬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皆不退轉。阿難！此缽、舍利廣行教化諸眾生已，於彌勒前虛空中住。’爾時，彌勒佛以手捧缽及佛舍利，告諸天、人、阿修羅、迦樓羅、乾闥婆、緊那羅、摩睺羅伽言：‘汝等當知！此缽、舍利，乃是釋迦牟尼如來雄猛大士信戒、多聞、精進、定智之所熏修。汝等當知，釋迦牟尼雄猛大士，能令無量百千那由他億諸眾生等住涅槃城，出過優曇缽花百千億倍，缽及舍利故來至此。’爾時，彌勒三藐三佛陀，為我此缽及我舍利起四寶塔，以舍利、缽置此塔中。爾時，彌勒佛及諸天、人、阿修羅、迦樓羅、乾闥婆、緊那羅、摩睺羅伽等，大設供養恭敬禮拜缽、舍利塔等。”《大正藏》編號 386，第 12 冊，第 1077 頁中欄第 3 行至第 21 行。

[10] 李靜杰《佛缽信仰與傳法思想及其圖像》，《敦煌研究》2011 年第 2 期，第 41–52 頁。

圖 1：中印度約前二世紀末葉巴爾胡特窣堵波欄楯浮雕運送舍利圖像

堵波南門裡面下欄，浮雕複雜的八王爭奪舍利圖像（圖 2），大城兩側有諸乘象來者，應為爭奪舍利的八王及其隨從，兩側上層中間各表現乘象載舍利盒離去情景，還刻畫供養人擎傘蓋供養舍利細節，起塔供養圖像則大塔四門所在多有。上述巴爾胡特、桑齊浮雕所見舍利盒作圓筒狀，盒蓋上設置蘑菇形鈕，應仿照中印度公元前後舍利盒形態而來。

值得注意的是，中印度公元前後窣堵波不見入涅槃、荼毗表現，這種情況關聯當時忌諱或猶豫表現釋迦其人的觀念與傳統，反映了採用佛陀象徵性表現的早期佛傳圖像面貌。中印度二、三世紀秣菟羅石刻造像，擺脫佛陀象徵性表現，釋迦形象作為信仰偶像流行開來，

圖 2：中印度約一世紀初葉桑齊大塔南門下欄裏面浮雕八王爭奪舍利圖像

圖 3：中印度秣菟羅二、三世紀浮雕釋迦五相圖像

佛傳圖像注重表現幾大佛教聖地發生事跡，出現入涅槃圖像，而不見荼毗和舍利關聯圖像。如秣菟羅博物館藏二、三世紀浮雕釋迦五相圖像，由左向右（以載體為基準確定左右，下同）依次表現樹下誕生、降魔成道、三十三天降下、初轉法輪、入涅槃場面（圖 3）。

總體而言，在佛教物質文化發生地中印度公元前後數百年間，先出現運送舍利、爭奪舍利、起塔供養圖像，再出現入涅槃圖像，均屬於佛傳故事圖像範疇，關聯犍陀羅同類圖像，兩地又呈現較大差異性。

在數量可觀的犍陀羅雕刻造像中，舍利供養圖像高頻率出現，表現形式大體可以劃分成作為佛傳故事、作為獨立信仰表現的舍利供養圖像，以及著重個人情懷的持舍利供養圖像三種類型。

1. 作為佛傳故事表現的舍利供養圖像

犍陀羅以佛傳故事浮雕發達著稱，通時性表現的釋迦一生事跡浮雕約佔犍陀羅石刻總量之半，在入涅槃之後通常連帶表現荼毗、爭舍利、分舍利、運舍利、起塔供養等場面，形成連貫性涅槃系列畫面。

諸如，白沙瓦博物館藏犍陀羅盆地塔克特依巴依（Takht-i-Bahi）出土二、三世紀塔身前浮雕涅槃系列圖像，由上而下表現釋迦佛來到拘屍那城、入涅槃、分舍利、起塔供養場面（圖 4），比較完整地描述了釋迦佛一生最後的里程。在婆羅門徒盧那為八王分舍利的場景中，其人坐在正中、左手下右手上托一小口大腹的舍利瓶，其前方台上置 5 個舍利瓶，左右兩邊各一人手托舍利瓶。8 個舍利瓶正好與徒盧那身後及左右兩邊的 8 個人對應。巴黎集美美術館藏二、三世紀

圖 4：犍陀羅盆地塔克特依巴依出土二、三世紀浮雕涅槃系列圖像

圖 5：巴黎集美美術館藏犍陀羅二、三世紀浮雕分舍利等圖像

犍陀羅浮雕，左右側分別表現婆羅門徒盧那分舍利、八王分得舍利騎馬離去場面（圖 5），從現有場面推測原初可能屬於涅槃系列圖像中的一部分。

這種作為佛傳故事表現的舍利供養圖像，意在表述釋迦的豐功偉績，形成完整的傳記鏈條，舍利已然成為象徵佛陀的聖物，但還不具備獨立信仰內涵。

2. 作為獨立信仰表現的舍利供養圖像

在犍陀羅雕刻中，出現一些脫離佛傳故事、作為獨立信仰表現的舍利供養圖像。這種情境中的舍利，不僅象徵釋迦佛，還被賦予象徵佛法或佛教的意涵。此情況不見於公元前後中印度佛教物質文化，反映了犍陀羅舍利供養的新發展。

諸如，拉合爾博物館藏二、三世紀釋迦佛立像，台座前面浮雕 4 比丘和 2 世俗女子禮拜供養舍利盒場面（圖 6–1、6–2）。該例釋迦佛與其舍利盒組合表現，舍利實際成為中心表述內容。在釋迦佛已經存在情況下，此舍利似乎在於象徵佛法或佛教之意涵。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犍陀羅二、三世紀菩薩立像，台座前面浮雕 5 比丘和 1 世俗女子禮拜供養舍利盒場面（圖 7–1、7–2）。從左手下垂姿勢和束發形式推測，該像原應為手提淨水瓶的彌勒菩薩。彌勒菩薩繼釋迦佛之後成佛教化眾生，彌勒菩薩與舍利盒組合，示意此舍利不止於象徵釋迦佛，應該還有象徵佛法或佛教的用意，如此方能表述彌勒菩薩將來成佛傳承佛法的意涵。

斯瓦特博物館藏斯瓦特河谷卡特來窣堵波（Katelai stupa）出土二、三世紀塔身前浮雕，尖拱券形龕內物象分四層表現，由下而上分別為

圖 6-1：拉合爾博物館藏犍陀羅二、三世紀釋迦佛像

圖 6-2：拉合爾博物館藏犍陀羅二、三世紀釋迦佛像臺座浮雕供養舍利圖像

圖 7-1：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犍陀羅二、三世紀彌勒菩薩像

圖 7-2：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犍陀羅二、三世紀彌勒菩薩像臺座浮雕供養舍利圖像

圖 8：斯瓦特博物館藏卡特來窣堵波出土二、三世紀浮雕圖像

降魔成道、供養法輪、供養佛缽、供養舍利場面（圖 8）。降魔成道場面一方面構成佛傳的一環，另一方面意味著成就法身，即獲得佛教真理的表現。從該浮雕圖像組合因素來看，顯然強調了法身意涵。上方法輪、佛缽、舍利具有相近內涵，用於代表佛法或佛教。

以上三例所见舍利盒，皆被置于台座上。前二例舍利盒不仅位于台座上，还被安置在上有寶蓋的方形龕中供養。这种单独供奉舍利盒的表现方式，一来反映了當時僧俗供養舍利的實況，二来更加明確了舍利作為獨立信仰表現的意圖。

3. 著重個人情懷的持舍利供養圖像

在犍陀羅雕刻中，出現少許不同身份人物持舍利供養圖像，明顯

著重個人虔誠的情懷，不同於上述兩種舍利供養形式。已知此種圖像多出於斯瓦特河谷早期佛教雕刻之中。

諸如，斯瓦特博物館藏斯瓦特河谷布特卡拉Ⅰ（Butkara Ⅰ）出土一、二世紀科林斯式柱頭浮雕，花精女在莨苕葉叢中露出上半身、左手托舍利盒（圖 9）。布特卡拉Ⅰ出土一、二世紀浮雕殘片，一世俗男子捧舍利盒立在大門之中（圖 10）[11]。另一布特卡拉Ⅰ出土一、二世紀浮雕殘片，二世俗男子捧舍利盒並行而來（圖 11）[12]。斯瓦特

圖 9：斯瓦特博物館藏布特卡拉Ⅰ出土一、二世紀科林斯式柱頭浮雕圖像

[11] Domenico Faccenna, *Sculptures from the Sacred Area of Butkara* Ⅰ, Part 2, Roma: Istituto Poligrafico Dello Stato Libreria Dello Stato, 1964, p. 41 (No. 895), pl. CXLⅠ.

[12] 前引Faccenna, *Sculptures from the Sacred Area of Butkara* Ⅰ, Part 2, p. 42 (No. 2527), pl. CXLⅦ.

圖10：布特卡拉Ⅰ出土一、二世紀浮雕一人捧舍利供養圖像（出自Faccenna, *Sculptures from the Sacred Area of Butkara* Ⅰ, Part 2, pl. CXLⅠ.）

圖11：布特卡拉Ⅰ出土一、二世紀浮雕二人捧舍利供養圖像（出自Faccenna, *Sculptures from the Sacred Area of Butkara* Ⅰ, Part 2, pl. CXLⅦ.）

博物館藏斯瓦特河谷潘爾Ⅰ（Panr Ⅰ）出土一、二世紀世俗男子持舍利盒供養像（圖 12）。南京大報恩寺博物館藏一、二世紀犍陀羅女子托舍利盒供養像（圖 13），接近斯瓦特河谷造像風格。這些實例均表現為個人持舍利盒供養造型，多數為世俗男女，也有花精女，寄託著他們對舍利的虔誠敬意，似乎還有因此獲取功德利益的願望。

这些犍陀罗造像所见舍利盒形制，酷似塔克西拉博物館藏二、三世紀犍陀羅舍利盒（圖 14），應參考實際舍利盒形態刻畫而成。這種筒身裝飾弦紋帶、盒蓋頂端飾蘑菇形蓋紐的筒狀舍利盒，與前述中印度公元前後巴爾胡特、桑齊窣堵波欄楯和塔門浮雕舍利盒相近，表明

圖 12：斯瓦特博物館藏潘爾 I 出土一、二世紀男子托舍利供養圖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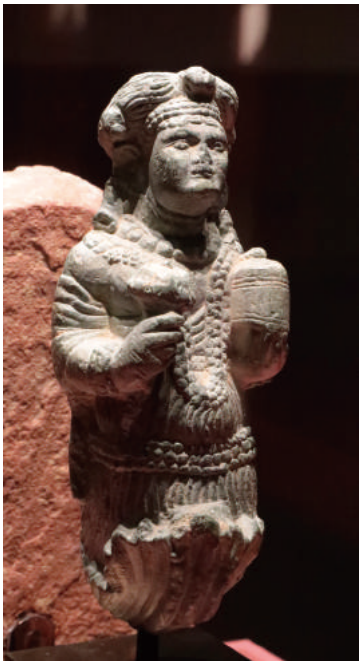

圖 13：南京大報恩寺博物館藏犍陀羅一、二世紀女子托舍利供養圖像

圖 14：塔克西拉博物館藏犍陀羅二、三世紀舍利陶盒

圖像上存在前後傳承發展關係。上述中印度公元前後窣堵波浮雕，以及西北印度犍陀羅浮雕舍利盒，圓筒形塔身有隆起的弦紋帶，盒蓋中間凸起，蓋上設置蘑菇形鈕，分別與窣堵波的塔身、覆缽頂、上端傘蓋對應，顯然具有窣堵波的象徵意義。在這種舍利盒中收藏舍利，實際等同於起塔供養，也就是說舍利盒本身已經反映了舍利供養行為。

二、南北朝後期持舍利供養圖像

在漢文化地區，犍陀羅作為佛傳故事和獨立信仰表現的舍利供養圖像十分稀少，而持舍利供養圖像獲得較大發展。南北朝後期，中原東部地區和成都地方的單體造像幾乎同時出現持舍利供養圖像。

1. 中原東部地區北朝後期持舍利供養圖像

中原東部地區實例包括背屏式造像和造像碑兩種形式，集中在山東、河北、河南三省的發達區域，出現於北魏晚期（494–534），東魏（534–550）、北齊（550–577）持續發展，暫且沒有發現隋代實例，已知實例數量較少。

諸如，①山東青州龍興寺遺址出土北魏晚期立佛並脅侍二菩薩像，二菩薩各以左手托扁圓形舍利盒供養（圖 15–1、15–2）。②河北臨漳鄴城北吳莊造像窖藏坑出土東魏立佛並脅侍二弟子、二菩薩、二梵王像，左側年老弟子左手下右手上托扁圓形舍利盒供養（圖 16）。③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藏河南中牟北齊天保二年（551）造像碑，碑陽表現一坐佛並脅侍四弟子、二菩薩、二梵王像，左側年老弟子左手托圓筒形舍利盒供養（圖 17）。碑陽龕內佛法會場面與龕楣維摩、

圖 15-1：青州龍興寺遺址出土北魏晚期造像

圖 15-2：青州龍興寺遺址出土北魏晚期造像二脅侍菩薩

圖 16：臨漳鄴城北吳莊出土東魏造像及其局部

圖 17：中牟北齊天保二年（551）造像碑及其局部

圖 18-1：博興興益出土北齊造像碑

圖 18-2：博興興益出土北齊造像碑局部

文殊對坐圖像組合，形成釋迦佛說維摩詰經結構，可知主尊佛為釋迦佛。④山東博興興益出土北齊造像碑，碑陽表現一坐佛並脅侍二弟子、二菩薩、二梵王像，左右側弟子各左手下右手上托圓筒形舍利盒供養（圖 18–1、18–2）。主尊上方兩側表現象徵維摩詰經的維摩、文殊對坐說法，以及用於法華經方便說法的諸佛傳圖像，示意佛在演說這兩部佛經[13]，此二經典教主則是釋迦佛。

主尊或立或坐，當時沒有與特定尊格聯繫。實例③、④由圖像組合推知主尊為釋迦佛，其餘 2 例無銘文者作為釋迦佛法會表現的可能性較大。這些實例舍利盒有扁圓形、圓筒形兩種，多數由脅侍弟子手托，又分為左側年老弟子手托、兩側弟子手托兩種情形，以左側年老弟子手托者居多，也有二脅侍菩薩手托情形，又以左手下右手上手托姿勢為多。上述實例兩種扁圓、圓筒形舍利盒，見於河北定州靜志寺北宋塔基地宮出土北朝晚期至隋代舍利銅盒（圖 19、20）[14]，圓筒形舍利盒還見於河北正定白店村出土隋代石函中圓筒形舍利銅盒[15]，表明造像表現佛弟子、菩薩所持舍利盒本是模仿實物所為。河北出土圓筒形舍利盒與前述塔克西拉博物館藏犍陀羅舍利盒相仿（圖 14），而且盒蓋頂端都有蘑菇形把手，說明兩者間確實存在影響關係[16]。

---

[13] 李靜杰《中国における五～六世紀の法華経美術の研究——麦積山北魏晚期第 10 号碑像の図像構成——》,《鹿島美術研究》年報第 19 号別冊，东京鹿島美术财团，2002 年，第 1–13 頁。李靜杰《北朝後期法華經圖像的演變》,《藝術學》第 21 期，臺北：藝術家出版社，2004 年，第 67–108 頁。

[14] 定縣博物館《河北定縣發現兩座宋代塔基》,《文物》1972 年第 8 期，第 39–51 頁。

[15] 趙永平、王蘭慶、陳銀鳳《河北正定縣出土隋代舍利石函》,《文物》1995 年第 3 期，第 92–95 頁。

[16] 參考冉萬里《古印度舍利容器集錦及初步研究》,《西部考古》第 11 輯，2016 年，第 204-236 頁。

圖 19：定州靜志寺北宋塔基地宮出土北朝晚期至隋代扁圓形舍利銅盒

圖 20：定州靜志寺北宋塔基地宮出土北朝晚期至隋代圓筒形舍利銅盒

圖 21-1：成都萬佛寺遺址出土南梁普通四年（523）釋迦佛像及其局部

圖 21-2：成都萬佛寺遺址出土南梁普通四年（523）釋迦佛像左側面天王

2. 成都地方南梁持舍利供養圖像

成都地方南梁（502–557）實例概為背屏式造像，已知實例數量較多。諸如，①四川博物院藏成都萬佛寺遺址出土南梁普通四年（523）釋迦立佛，脅侍四弟子、四菩薩、二天王，左外側弟子左手托圓筒形舍利盒，左右外側菩薩各自左手下右手上托舍利罐（圖 21–1），造像左側面天王左手托圓筒形舍利盒供養（圖 21–2）。②四川博物院藏成都萬佛寺遺址出土南梁普通六年（525）釋迦坐佛，脅侍四弟子、四菩薩、二力士，左側脅侍已殘缺，右內側脅侍菩薩左手下右手上托舍利罐供養。③成都博物院藏成都西安路出土南梁中大通二年（530）釋迦立佛，脅侍四弟子、四菩薩、二力士像，右內側菩薩左手下右手上托舍利罐供養（圖 22）。④四川大學博物館藏成都地方南梁中大通四年（532）釋迦立佛像，脅侍四弟子、六菩薩、二力士像，左右前方菩薩各以外側手托舍利罐供養（圖 23）。⑤四川博物院藏成都萬佛寺遺址出土南梁中大通五年（533）釋迦立佛，脅侍四弟子、四菩薩、二力士像，右內側菩薩左手下右手上托舍利罐供養（圖 24）。⑥四川博物院藏成都萬佛寺遺址出土南梁中大同三年（實則太清二年）（548）觀世音菩薩立像，脅

圖 22：成都西安路出土南梁中大通二年（530）釋迦佛像

圖 23：成都地方南梁中大通四年（532）釋迦佛像

圖 24：成都萬佛寺遺址出土南梁中大通五年（533）釋迦佛像及其局部

圖 25：成都萬佛寺遺址出土南梁中大同三年（548）觀世音菩薩像及其局部

侍四弟子、四菩薩、二力士像，左右內側菩薩各外側手下內側手上托舍利罐供養（圖 25）。⑦成都博物院藏成都商業街出土南梁立佛，脅侍四弟子、四菩薩、二力士像，左右內側菩薩各左手下右手上托舍利罐供養（成考所 90CST ⑤ :7）。⑧四川博物院藏成都萬佛寺遺址出土南梁坐佛，脅侍二弟子、二菩薩、二力士像，左右側菩薩各內側手下外側手上托舍利罐供養（川博 3527 號）。

上述實例主尊多為立佛，少數為結跏趺坐佛，個別者為觀世音立菩薩。實例① – ⑤主尊為釋迦佛，實例⑥主尊為觀世音菩薩，2 無銘文實例推測作為釋迦佛法會表現可能性大。這些實例舍利罐呈渾圓有蓋形制，普遍由脅侍菩薩托舍利罐供養[17]，主尊兩側各一脅侍菩薩

[17] 這些舍利罐大多有蓋，考古報告以為缽，或稱作圓形物，不妥。參考四川博物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學博物館編著《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又，成都博物院藏成都西安路出土南梁三佛造像（成考所 H1: 6），兩側佛像各自捧缽，其缽無蓋，明顯有別於脅侍菩薩手托之物。

手托多於單側一菩薩手托實例，又以左手下右手上手托姿勢為多，相繼影響關係比較明顯。實例①另有弟子、天王托圓筒形舍利盒，屬於特殊情況。

比較上述兩個地區持舍利供養圖像，中原東部地區流行扁圓形和圓筒形舍利盒，多由脅侍弟子手托，而成都地方流行渾圓形舍利罐，概由脅侍菩薩手托，兩地普遍採用左手下右手上手托姿勢則是共同特徵。已而，兩地各自呈現其地域性的同時，也體現了一些時代共通性。

三、唐前期持舍利供養圖像

唐前期（618–755）持舍利供養圖像繼續發展，已知實例比較集中地分布在洛陽地方、川北地區石窟。洛陽地方流行持舍利瓶供養，而川北地區流行持經函供養，前者為生身舍利，後者則屬於法身舍利。

1. 洛陽地方唐前期持舍利供養圖像

洛陽地方唐前期實例集中在龍門石窟，數量較少。諸如，①洛陽龍門初唐前段賓陽南洞後壁造像，主尊結跏趺坐佛脅侍二弟子、二菩薩像，右脅侍年輕弟子手捧舍利瓶供養（圖 26）。右脅侍菩薩頭冠正中浮雕寶瓶，左脅侍菩薩頭冠正中浮雕物被鑿取，從二者組合情況推測左脅侍菩薩頭冠正中原初可能浮雕化佛，暗示中間主尊佛為阿彌陀佛。②洛陽龍門初唐前段賓陽北洞後壁造像，主尊結跏趺坐佛脅侍二弟子、二菩薩像，右脅侍年輕弟子左手下右手上托舍利瓶供養（圖 27）。左脅侍菩薩頭冠正中浮雕化佛，右脅侍菩薩頭冠遭破壞，從二者組合情況推測右脅侍菩薩頭冠正中原初可能浮雕寶瓶，暗示中間

圖 26：洛陽龍門初唐前段賓陽南洞後壁造像及其局部

圖 27：洛陽龍門初唐前段賓陽北洞後壁造像及其局部

主尊佛為阿彌陀佛。③洛陽龍門初唐前段雙窯北洞，西壁主尊結跏趺坐佛脅侍二弟子、二菩薩像，左脅侍年老弟子左手下右手上托舍利盒供養。南北壁各有一立佛二菩薩，西壁坐佛作為釋迦佛表現可能性大。④洛陽龍門唐永隆元年（680）萬佛洞後壁造像，主尊結跏趺坐佛脅侍二弟子、二菩薩像，左脅侍年老弟子左手下右手上托舍利瓶

圖 28：洛陽龍門唐永隆元年（680）萬佛洞後壁造像及其局部

圖 29：國家博物館藏西安出土唐武德八年（625）智藏禪師玻璃、銀質舍利瓶

供養（圖 28）。此五尊像上方浮雕五十二菩薩，因五十二菩薩是與阿彌陀佛組合的瑞像[18]，由此推知主尊為阿彌陀佛。

主尊一概結跏趺坐，實例①③④推知為阿彌陀佛，實例③推測為釋迦佛。阿彌陀佛佔有多數是當時西方淨土信仰上升的反映，脅侍供養舍利沿用了以往釋迦佛法會同一表現，對於阿彌陀佛法會而言則缺乏實際意義。這些實例概由弟子托舍利瓶供養，由右側年輕弟子或左側年老弟子手托不定，又以左手下右手上托姿勢為多。諸例舍利瓶形狀雖不完全相同，但都表現為瘦長形，大體可以與國家博物館藏西安出土唐武德八年（625）智藏禪師玻璃、銀質舍利瓶比較（圖 29）。

2. 川北地區唐前期持舍利供養圖像

川北地區持舍利供養圖像出現於隋代，主要流行於唐前期。巴中西龕佛爺灣隋代前後 18 號龕像（圖 30），主尊結跏趺坐佛脅侍二弟子、二菩薩，左脅侍弟子左手下右手上托經函供養。其後，持經函供養成為川北地區唐前期基本的舍利供養形式。

川北地區唐前期持經函供養圖像，集中在廣元、巴中兩個相對發達地方，已知實例較多，基於主尊形態可以分為三組。

第一組主尊為結跏趺坐佛。①廣元千佛崖唐前期 140 號龕，主尊跏趺坐佛脅侍二弟子、二菩薩、二力士像，右脅侍年輕弟子左手下右手上托經函（已殘破）供養。②廣元千佛崖唐開元十年（722）513 號韋抗窟，主尊跏趺坐佛脅侍二弟子、二菩薩像，右脅侍年輕弟子左手下

---

[18] 四川梓潼臥龍山千佛崖貞觀八年（634）1 號龕造像碑《阿弥陁佛并五十二菩薩傳》：“阿弥陁佛五十菩薩像者，蓋西域之瑞像也。”道宣（596–667）於麟德元年（664）撰《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二〈隋釋明憲五十菩薩像緣三十七〉：“阿彌陀佛五十菩薩像者，西域天竺之瑞像也。”《大正藏》第五十二冊，第 421 頁上欄第 17–18 行。

圖 30：巴中西龕佛爺灣隋代前後 18 號龕像及其局部

圖 31：廣元千佛崖唐開元十年（722）513 號韋抗造像窟及其局部

圖 32：廣元千佛崖盛唐 689 號窟造像局部

圖 33：廣元千佛崖盛唐 421 號窟造像及其局部

右手上托經函供養（圖 31）。③廣元千佛崖盛唐 689 號窟，主尊跏趺坐佛脅侍二弟子、二菩薩、二力士，右脅侍年輕弟子左手下右手上托經函供養（圖 32）。④廣元千佛崖盛唐 421 號窟，主尊跏趺坐佛脅侍二弟子、二菩薩、二力士像，右脅侍年輕弟子左手下右手上托經函供養（圖 33）。⑤巴中南龕盛唐 17 號龕，主尊跏趺坐佛脅侍二弟子、二菩薩、二力士像，左脅侍弟子（頭部重修）雙手捧附著托布的經函供養，托布襯托經函之貴重（圖 34）。⑥巴中水寧寺盛唐 8 號龕，主尊跏趺坐佛脅侍二弟子、二菩薩、二天王、二力士像，右脅侍年輕弟子左手下右手上托經函供養，刻意傾斜經函並向下抽出一段函蓋，以呈現其中經卷形態（圖 35）。這些實例僅個別有題記卻沒有說明尊格，實例⑥施轉法輪印、著通肩式袈裟，為唐代阿彌陀佛標準造型，其餘推測作為釋迦佛法會表現的可能性大。

第二組主尊為倚坐佛。⑦廣元千佛崖初唐 138 號窟，主尊倚坐佛脅侍二弟子，右脅侍年輕弟子左手下右手上托函供養（圖 36），此函形體較窄，可能是工匠不經意所為，從川北石窟整體情況推測應該屬於經函。⑧廣元千佛崖初唐 788 號窟，主尊倚坐佛脅侍二弟子、二菩薩、二力士像，右脅侍年輕弟子左手下右手上托經函（已殘破）供養。就唐前期倚坐佛通常作為彌勒佛表現的情況推測，此 2 例應為彌勒佛法會表現。

第三組主尊為立佛。⑨廣元千佛崖盛唐 214 號窟，主尊立佛脅侍二弟子、二菩薩、二力士像，左脅侍年老弟子左手下右手上托經函供養（圖 37）。基於當時釋迦佛、藥師佛流行立像的情況，難以確定主尊尊格。

在上述實例之外，⑩巴中南龕盛唐 22 號龕主尊為結跏趺坐施轉法輪印阿彌陀佛，脅侍二弟子、二菩薩、二力士，右脅侍年輕弟子左

圖 34：巴中南龕盛唐 17 號龕造像

圖 35：巴中水寧寺盛唐 8 號龕造像及其局部

圖 36：廣元千佛崖初唐 138 號窟造像及其局部

圖 37：廣元千佛崖盛唐 214 號窟造像及其局部

圖 38：巴中南龕盛唐 22 號龕像

圖 39：巴中南龕盛唐 77 號龕像（王劍平提供）

圖 40：巴中水寧寺盛唐 3 號龕像及其局部

圖 41：巴中水寧寺盛唐 9 號龕像局部

手下右手上托一沓四本經書，經書下有襯布以示珍貴（圖 38）。⑪巴中南龕盛唐 77 號龕主尊結跏趺坐佛脅侍二弟子、二菩薩、二天王、二力士，右脅侍年輕弟子左手下右手上托捲軸經卷供養（圖 39）。⑫巴中水寧寺盛唐 3 號龕以倚坐彌勒佛、跏趺坐施轉法輪印阿彌陀佛為主尊，兩側脅侍八弟子、二菩薩，右壁菩薩外側弟子左手執捲軸經卷供養（圖 40）。⑬巴中水寧寺盛唐 9 號龕主尊結跏趺坐佛遭破壞，脅侍二弟子、二菩薩、二力士，右脅侍弟子左手上右手下執捲軸經卷供養（圖 41）。目前所知執經書、經卷供養實例集中在巴中，可能是一種地方性造型。相對於經函而言，經書、經卷表現意圖更為直觀，卻依然是法舍利屬性。另外，成都周圍丹棱劉嘴中唐前後造像也見有弟子托經函供養圖像，但已經數量稀少了。

統觀川北石窟實例，多數持長方體經函供養，經函完整者有厚實的函蓋，有的函身與蓋錯開，顯現其中經卷形態，還出現少數托舉經書、經卷供養實例。所有實例由一側脅侍弟子托經函，右脅侍年輕弟子手托遠多於左側年老弟子手托情形，而且弟子左手下右手上托姿勢佔有絕對多數。從各實例時間來看，應為巴中隋代造像影響廣元、巴中形成的區域性造型。上述造像主尊小部分可以根據造型明確界定為阿彌陀佛、彌勒佛，大部分應為釋迦佛，持舍利供養與多種主尊相聯繫，顯然是習慣性造型所致。

比較上述兩個地區持舍利供養圖像，由弟子托舍利容器成為兩地共同時代特徵，沿襲南北朝的左手下右手上手托姿勢獲得大發展。洛陽地方持舍利瓶供養，以及川北地區持經函供養，形成兩地顯著區域特徵。川北石窟以經函（或經書、經卷）代替舍利盒、罐、瓶供養，表明此地佛教徒尤其重視法身舍利，意味著對舍利內涵的理解更加深刻了。

四、小結

上述南北朝後期造像在中原東部地區持舍利盒、成都地方持舍利罐供養，唐前期造像在洛陽地方持舍利瓶、川北地區持經函供養，形成各自區域性特徵。兩個時段同時流行於中原與四川盆地，這種情況並非偶然。一方面暗示它們由來於共同的造像傳統，彼此之間存在影響關係，且有一定的思想內涵；另一方面反映了各自地域文化傳統和審美情趣。南北朝後期中原東部地區多由弟子、成都地方多由菩薩托舍利容器，唐前期普遍由弟子托舍利容器供養。南北朝後期、唐前期持舍利供養圖像一概出現在佛教法會場面中，釋迦佛法會佔有絕大多數，少許為彌勒佛法會、阿彌陀佛法會和觀世音法會。

南北朝後期至唐前期，佛教深入普及到社會各階層，大乘佛教波羅蜜思想廣為流行。與此同時，漢文化地區佛教物質文化高度發達，持舍利供養圖像產生並獲得較大發展。如前所述，大乘佛教以為舍利是波羅蜜熏修所成，弟子、菩薩脅侍在主尊佛兩側持舍利供養，意味著佛陀在向他們講述自己過去如何修習波羅蜜，才成就金剛不壞法身，也就是說舍利代表著修習波羅蜜之事。由此而言，持舍利供養最適合於釋迦佛，也就是弟子、菩薩供養釋迦佛舍利的表現。事實上不止於此，少數實例主尊彌勒佛脅侍弟子持舍利供養，此種情況解釋為彌勒佛傳承釋迦佛舍利代表的佛法，似乎更為妥當。至於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脅侍弟子或菩薩持舍利供養，應是受到釋迦佛脅侍持舍利供養圖像影響的結果，難以說有何實在意義。

那麼，在犍陀羅與漢文化地區之間，舍利供養圖像有怎樣的關聯呢? 犍陀羅作為佛傳故事、獨立信仰表現的舍利供養圖像，在南北朝時期幾乎不見，唐代少許作為佛傳故事表現的舍利供養圖像又是基

於漢譯經典造型的，可以說幾乎看不出兩者之間有何聯繫。唯有持舍利供養圖像流行於兩地，不過犍陀羅著重個人情懷，而漢地意在波羅蜜熏修所成，尤其持經函的所謂法身舍利供養，是漢文化地區的一大發展，佛教文化環境差異導致兩者內涵有別。值得注意的是，犍陀羅持舍利供養圖像主要流行於斯瓦特地區約一、二世紀，東傳時間不是發生在犍陀羅文化因素大量輸入漢地的北魏中期（439–493），而是出現於北魏晚期、南梁，導致此種現象的原因還不清楚。從南北朝後期中原東部造像表現圓筒形舍利盒，以及出土圓筒形舍利盒與犍陀羅同類器物的一致性表明，兩地舍利供養確實存在著內在聯繫。再者，唐後期持舍利供養圖像近乎消逝，可能關聯當時菩薩行思想衰退，尤其是淨土信仰和救濟思想盛行之背景。

附記：本稿未註明出處圖片由李靜杰實地拍攝。